

略论川陕苏区统战工作的现实启示

冯宝明 吴沂珀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27年至1937年，为继续推进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紧紧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要同盟军，建立和巩固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这一时期，除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在全国以燎原之势覆及江西、福建、广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等省，广泛的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1932年12月至1935年4月建立的川陕苏区，最盛时期面积达到4.2万平方公里，人口达700余万，建立了23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1]作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围绕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展了大量有益的统战工作实践，为推进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奠定群众基础作出了理论和实践贡献。本研究在尽量收集有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旨在系统梳理土地革命时期川陕苏区统战工作情况，总结统战工作有益经验，为更好的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在全市奋力后发赶超振兴发展、加快建设“三市两地一枢纽”中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提供参考。

一、川陕苏区统战工作的历史背景及条件

（一）统一战线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

统一战线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思想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许多经典著作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过重要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理论的奠基人，提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和团结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重

要观点。^[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战胜敌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3]。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依据。同时，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也为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革命中进行实践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土壤。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军事斗争策略，儒家文化的“合和”思想本身就带有多多样性的统一和合作共赢的内涵。这些文化精髓中蕴含着丰富的统战思想，为践行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基础。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社会中存在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众多阶级成分。这些阶级中，农民阶级人数最多，革命要求也相对强烈；其次是和农民阶级有共同之处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具有较为鲜明的革命要求；最后是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也一定程度具有妥协性。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敌人，作为革命运动主力的工人阶级在全国人口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一。现实决定了中国革命单凭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出路，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尽最大努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在中国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实践的现实需要。

（二）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和实践

党从成立起就注意发动工农群众参与革命。1923年6月，党的三大制定了《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联合小农佃农和雇工的要求。^[4]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肯定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4]毛泽东同志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阐明了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成败的关系，对发展工农联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进行

了有益的实践探索。这种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相结合的武装割据思想的具体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实际开端。**1927**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叛变革命，建立起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彻底明白，必须要广泛发动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广泛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党中央对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教训作出了初步总结，确定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5]**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正确分析革命形势后，指出“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出共产党应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6]至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并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川陕苏区正是在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组织动员工农群众等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三）土地革命路线的探索和推行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能否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关系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一个基本问题。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和实行经历了长时间的曲折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武装，发动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进行革命反击。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党内产生一种急躁情绪和冒险主义。**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了“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共有”的错

误主张。^[7]这个有悖于中国国情的左倾政策，不仅打击了自耕农利益，也把一部分中立阶级推向了敌对力量，给红军的军需造成严重困难。1928年7月，党的六大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系列文献，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的政策，明确规定了土地革命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并指出区别对待富农使之中立，保护工商业，并肯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8]由于没有土地革命具体的分配方针和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的承担了这一重任，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基本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此时，在鄂豫皖根据地，采取中农土地不动、只没收地主土地和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1930年5月，李立三左倾路线教条主义提出了要在各地办集体农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9]一些地主被迫上山当土匪，干扰了社会治安，影响了分田斗争。党内先后通过“南阳会议”和“峡江会议”批判了这一过激政策，制定了给富农和地主出路的政策，到1930年底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夸大了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提出消灭富农经济的过左政策。^[10]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长达4年，此时正值川陕苏区建立发展的时期。这种“左”倾主义的错误对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四川军阀混战的统战有利形势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南北方军阀对立的形势中，川军头目通过历次战争扩大军事实力，并借助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驻军防区范围形成各派军阀势力。1926年至1927年北伐战争中，四川军阀改旗易帜为“国民革命军”，但军阀割据的实质并未根本改变。1927年至1937年间，

四川的地方政权主要由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 5 个军阀掌握。^[11]在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方面，1928 年“北伐”成功后的南京政府积极对四川开展争取工作，但遭到以刘湘为首的各路四川军阀的多次抵制。^[12]四川始终在南北之间保持中立，在行政、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自主性。南京国民政府与四川地方势力貌合神离，上下并不完全统一。在四川军阀内部关系方面，5 个军阀大致可分为“速成系”和“保定系”两派。刘湘、杨森两派的大多军官因就读过四川陆军速成学校，被称为“速成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派大多军官就读陆军小学与陆军中学，被称为“保定系”；二者之间矛盾重重，相互排挤排斥。加之四川军阀在各自驻军防区内自成独立王国，具有管理行政、征收捐税、任命官员等一切职能，军阀间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地盘争夺与军队扩大问题上矛盾不断，相互战争时有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四川军阀间的矛盾。仅 1932 至 1933 年期间，先后发生刘文辉、田颂尧的成都巷战，刘湘、刘文辉的荣威之战，刘文辉、邓锡侯的昆河对峙及二刘的岷江对峙诸役等。^[13]1932 年 11 月，红四方面军达到川陕边区时，四川各路军阀正在成都区域相互战争，占据川北的田颂尧主要精力在参与混战、不能兼顾后方，加之蒋介石不能从四川以外调集军事力量围剿红军，给红军在川陕边区立足提供了绝佳机会。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境内后，由于军阀间的分裂，认为“防区积习未破，各军以为未攻我防，无协力攻击之必要，刘（湘）、杨（森）两军虽各出兵数旅，然主旨是在防堵，并无进攻意图”^[14]，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集中兵力攻击红军。在川陕苏区的发展中，也是因为川军军阀间的相互矛盾，为苏区开展有效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条件。

（五）川陕苏区的社会群众基础

四川处于中国内陆腹地，成都平原四周山区环绕，与外界不易接触，自古就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说法。以通（江）

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苏区地理位置偏僻，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内部更加封闭，加之军阀和地主的封建统治，相较全国其他根据地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革命思想基础薄弱。红军入川前，苏区内群众思想保守，对外界先进思想的接受和扩散程度均不高。通南巴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少，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徐向前曾提到“很多农民在交通不便的山区里住着，对三民主义、国民革命听都没听过，别提那些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了”。^[15]二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在各路军阀的统治下，四川的广大群众生活处境悲惨。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35年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70余次，平均30天就有两次战争。^[16]为补充军需、积极备战，各军阀在防区肆意任命官员，随意印发货币，用各类名目的杂税冗赋收取钱粮，强迫劳动力参军，残酷压榨人民。盘踞川东北的军阀田颂尧、刘湘、刘存厚对农民课征田税、傍粮捐、枪弹捐、火线捐、壮丁费、马路费、种烟捐、月儿捐、瘾民捐、被服捐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蚊帐拴帐钩用的麻钱要收“帐钩捐”、进城穿草鞋要收草鞋捐、打赤脚要抽赤脚捐、因交不出捐税被吊打时还需给吊打费。^[17]除了苛捐杂税外，军阀还采取对田赋一年数征、年年加征的办法来搜刮民脂民膏。1933年，刘存厚统治的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的田赋预征到1983年；田颂尧统治的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阆中、苍溪、南部等县的田赋预征到1951年以后。^[18]面对军阀统治带来的严重灾难，社会民不聊生，广大群众迫切期望寻找出路。三是军阀对红军的负面宣传。川陕苏区建立之初，因从鄂豫皖地区转移而来，红四方面军处于“客军”地位，军中人员与川陕地区群众本身不具备紧密联系。当地民众对红军缺乏了解、未建信任、心存戒备，刻意保持距离。加之国民党开展大量虚假宣传，污蔑红军无恶不作、胡作非为。如《新新新闻》称“凡匪蹂躏之地，先将废册烧毁，所有财产土地衣物等，悉行没收，插筐为记，分与其匪徒及附和之流氓，至于房屋器具，在赤匪认为

不需要时，或打毁，或烧去，本人若稍迟疑，或现可惜状时，立遭杀害”。^[13]这种对红军妖魔化的宣传，加剧了群众恐慌，需要更加有效的开展统战工作。

二、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实践

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处于土地革命时期，正值全党上下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由于当时各级党组织中并没有统一的专门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红四方面军的统战工作实际上由党组织领导，由党委部门和苏维埃部门分别承担职责、各自发挥职能、共同推动落实。期间，通过建立各类组织、制定系统的政策措施、开展政治教育、维护同盟者权益等，主要巩固和拓展了下层统一战线，同时也一定程度有力争取了国民党军官、地方势力、工商人士、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为川陕苏区的建设发展凝聚广泛力量。

（一）组织建设

党领导下的各类组织是落实政策、组织群众、推动工作的主体，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红四方面军入川后，迅速建立了大量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对开展统战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党组织的建设。通江、南江、巴中解放后，红四方面军抽调数千名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工作队在各地开展建党、建政工作，把党组织建立在基层群众里面，建立在工厂农村甚至白区。1933年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任务移交给中共川陕省委。中共川陕省委常设机构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监察委员会，同时领导少共省委和各区委会。^[1]川陕苏区各县（市）均设有党委；在县（市）委领导下，乡设支部、村设小组，城市中设有街道支部。各级党组织迅速组织开展了政治动员、土地革命、组织群众等工作，为苏区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苏维埃政权建设。《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省工农

兵代表会议，这一政权，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群众”。^[19]省、县、区、乡村各级政权则采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20]村级苏维埃以下选举产生“十家代表”，明确了代表组织发动群众、解释宣传法令、反映政策执行情况等 5 项具体任务，尤其是严格监视地主、富农的反革命活动。^[21]1933 年 10 月，随着仪南、营渠、宣达战役的胜利，苏区得到空前发展。川陕苏区极盛时期，共设有 23 县 1 市、160 多个区、990 多个乡（市）、4300 多个村苏维埃政权组织，苏维埃机构设置完善。^[22]川陕苏区 700 余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中享有了各种权利和自由。特别是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妇女，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和男子享有同等的地位。通过让基层群众有效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实现了有效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革命的目的。三是群团组织建设。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斗争工作中，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帮助群众建立革命的组织”。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主要有工会（雇工会）、贫农团、少共（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普遍建立到乡、村一级，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有可以参加的团体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建立了 22 个县工会、160 余个区工会，吸收了 10 万左右的各业工人到工人组织中来；贫农团组织了占农村人口 60% 的贫农；组织起来的少先队约 3 万余人，机关团员青年 5000 余人；组织贫雇农、中农、市民、雇工家庭妇女参加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有 30 余万人，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都属罕见。^[23]通过各类群团组织，人民群众能够争取正当权益、参加革命活动，有效凝聚了最广大群众的力量。

（二）政策制定

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川陕苏区的统一战线政策，主要体现在党组织的工作材料和苏维埃政府关于政权组织法令、土

地法令、刑事法令、经济法令、优待法令、禁烟法令、劳动法令等各类法律规定中。一是在党组织工作材料方面。中共川陕省委共召开了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根据革命形势先后制发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白区工作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和粉碎国民党“包剿”的决议》等系列工作材料^[24]，明确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群团组织、加强宣传教育、开展白区群众和士兵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等各方面工作，体现了组织动员群众、分化敌对势力，建立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内容。比如，1932年12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号召开展土地革命，明确“凡白区工农、白区军队的士兵和官长来参加红军者，同样在苏区分得红军公田，由苏维埃负责代耕。其家属亦可到赤区来，照人口与劳动力量分受土地”。^[19]又如，1933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白区工作决议案》中，针对白色士兵工作指出“要注意到统一下层战线的运用，先最好组织以斗争委员会来指挥一切”，对白区群众工作指出“须注意被国民党地主、豪绅所欺骗去的农民，群众组织，要派人打入进去工作……夺取其中的贫农和积极革命分子到我们的周围来”“乡村工作中，主要内容……应该抓着贫农雇工来起核心作用……还要联合可靠的中农”“要建立各式各样的赤色团体，如农民协会来吸收大批中农贫农雇农加入，成为他们发动一切斗争的指挥部”。^[19]二是在苏维埃政权法律规定方面。1933年2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原则和内容为依据，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同时，结合川陕苏区工作实际，川陕省制定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及家属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苏区营业条例》《苏区禁戒鸦

片条例》《经济公社、合作社条例》《银行条例》等系列法律规定。^[25]在各项法律规定中，不同程度的体现了照顾农民、起义白军士兵、专门人才利益等内容，在经济、教育、生产等各领域工作中明确了有关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及家属条例》就明确“白区工农兵士来苏区参加红军的一律分与好田(名为红军公田)”“其家属并可移住赤区，一样享受优待条例的优待”。^[19]川陕苏区的这些政策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对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巩固红色政权、发展革命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 政治教育

为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形成广泛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共识，苏区党组织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积极开展各种层次的政治教育工作，灵活地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开展。红色士兵、白兵、农民、妇女、干部是这一时期政治工作的重点对象。一是宣传教育工作。政治宣传是我们党在苏区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对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革命思想、植入革命观念、激发反抗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省委宣传部、省苏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下沉到各级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区级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乡村苏维埃、各种群团组织等基层组织和部门，组建了宣传队、鏊字对、粉墨队、贴发队、木工组等系统而庞大的工作队伍。据原《国闻周报》第 12 卷第 19 期《川东北剿赤印象记》一文记载，“宣传队分经常、临时二种，经常宣传队是脱离生产、专任宣传；临时宣传队由各种革命组织临时组织之。地方各机关，县以上设经常宣传队，十人为一队，每县得设三到五队”。^[1]政治宣传主要以文字、口头和戏剧为主要形式，以传单、书册、门板、石刻、剧目、歌谣等为载体，用通俗化的语言文字、大众化的方式内容、生动化的标语口号，广泛宣传土地革命、红军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扩军和支援革命

战争、时事政策、妇女解放等内容，达到了有力夺取群众的目的。据统计，川陕苏区时期党政军群机关创办了报刊 30 多种，如《干部必读》出版了 127 期、《共产党》报出版了 100 期、《少年先锋》报出版了 80 期；《中国共产党党章》《怎样分配土地》《苏维埃组织法》《红色战士丛书》《政治工作读本》《革命三字经》《政治工作手册》等宣传小册子 100 余种，印发数十万册。^[24]作为具有川陕苏区特色的红军石刻，据 20 世纪 80 年代普查共有 4000 多幅，在宣传政策、鼓舞人民、震慑敌人、配合根据地开展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26]二是思想工作。为加强对革命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教育，苏区建立了一批专门学校，大批培养革命意志坚定的“自己人”。1933 年 2 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创办彭杨军政干部学校，主要培养部队班排以上干部和优秀党团员干部；^[27]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川陕省苏维埃学校，专门培训地方苏维埃干部。^[28]1933 年 3 月召开川陕省妇女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红军妇女学校，主要培养有革命前途的妇女。^[29]1933 年 7 月在通江创办省委党校，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同志。各县委还开办了党员、团员训练班和流动训练班，主要培训支部工作、政权工作和土地政策等。^[30]据有关资料反映，在南江、长赤两县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两年时间里，先后有 2000 余名党团员和干部参加省、县、区三级培训学习。^[31]同时为了开展群众思想工作，苏区开办了列宁学校、贫民学校、工农中学、专科学校等，编印了初级小学识字课本、童子团站岗读本、革命三字经、消灭刘湘三字经、列宁学校读本、红色战士丛书等教材，对贫雇农和中农等免费提供纸张、课本、笔墨和食宿，对学校教员大多提供吃穿供给或发放薪水、田地请人代耕，吸引和组织大批的青少年、工农群众参与培训学习。三是社会教育工作。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指出，“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各处都办工余学校、

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加紧识字运动”。^[19]川陕苏区通过深入基层群众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认识水平。在区、乡举办识字班，利用工余时间组织男女老少开展识字教育；在乡、村成立俱乐部，经常举行晚会、读报、讲演、唱歌、跳舞等活动，解释苏维埃一切法令和政策；在比较大的市镇建立阅报室，有《红军》《共产党》《苏维埃》《斧头》《少年先锋》等报纸和读物，并安排专人负责读给群众听，甚至还配有留声机；在县、区、乡普遍设立篮球场、足球场、跳高、跳远、杠架、平台、天桥等红场，配置各种运动器械，在组织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开展军事知识训练。^[32-33]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我们党有效地向广大群众传播党的主张、方针政策，迅速形成思想共识，凝聚起强大的群众革命力量。

（四）权益保障

1925年中共四大《农民问题决议》中明确指出，“宣传农民组织农民的方法，自当从目前的实际问题入手”。^[4]川陕苏区开展统战工作、扩大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除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还注重在维护构成统一战线各阶级利益方面开展实践探索，主要体现在开展土地革命、推动经济建设、发动禁烟运动等方面。一是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之前，在川陕边区占人口**9%-12%**的地主占有**74%-80%**的土地，地主按照上田二八分或三七分、中田四六分、下田对半分抽租，佃农还需无偿为地主做工，广大群众生活疾苦。^[17]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印发《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1934年秋编印了《平分土地须知》《农村阶级划分（五言歌）》，形象具体的阐明了土地改革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对农村阶级成分划分出了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成分，规定土地革命必须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同时也保障白区起义官兵、医师技术人才、专家教员等的土地权益。^[34]通过土

地改革，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生产关系，维护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瓦解了苏区反革命势力的基础，同时一定程度维护了特殊群体的利益，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二是推进经济建设。在建立苏区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县和区、乡、村分别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经委员，层层加强对苏区经济建设的领导。根据川陕边区交通闭塞、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经济极端落后等特点，提出“尽一切可能，开展必须的经济建设，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1]，并制定了各个时期和各个行业的具体工作措施。1933年6月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川陕苏区转变建设初期采取没收豪绅地主财产、征发富农多余的粮食、动员群众捐献物资等经济来源方式，主要通过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保证军需民用。通过全面恢复农业生产，在军事民用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和财税金融等方面落实具体措施，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的发展合作社经济，在法定范围内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川陕苏区经济建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有力地保证了革命战争和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三是开展禁烟运动。川陕苏区建立初期，四川是中国西南部种植生产鸦片最多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鸦片产量约在2万吨以上，种植面积约达800万亩。通、南、巴区域又是四川种植鸦片最多最集中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域烟田约占土地面积的30%-40%。^[35]红四方面军在开辟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把禁除鸦片作为关系到川陕边区人民切身利益和革命成败的重要斗争任务来完成，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加强宣传教育，贴出禁烟告示，揭露国民党军队强迫人民种、吸鸦片的罪恶行径，唤起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制定《禁戒鸦片条例》，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以及群团组织以身作则，带动和发动群众开展禁烟斗争，同时对土豪劣绅、种植农户、戒烟群体采取了分别对待、逐步禁除的办法，在短

短一年时间内实现了禁种禁吸。川陕苏区禁烟运动取得的巨大成绩，让广大群众深切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不断提升了党在川北人民心中的地位。

（五）自身建设

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中共川陕省党组织明确规定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经济纪律、保密纪律、工作纪律等各个方面的纪律。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若违反则会受到诸如“初犯受教育，二次剥点皮，再犯头落地”的处分与制裁^[31]。铁的纪律铸就了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塑造了党的优良作风，树好了红军队伍的良好形象，不仅有效保证了各项统战政策和工作落到实处，也为团结影响广大群众和统战对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一是发挥组织作用。中共川陕省委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系统明确了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质量、建立健全支部、培养与提拔干部、提高党员的理论学习、严密党的纪律等工作任务，尤其注重发挥基层党支部在联系群众、影响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党要在各县各区建立模范支部，实行支部间的工作竞赛”。^[19]二是加强制度建设。1933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制发了《党员须知》，在党员与党的关系怎样、党员在群众中应该怎样去活动、党员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自我批评、缴纳党费、读党的文件、怎样开会、干事会的工作等多个方面，对党组织活动和党员行为进行较为完备的制度规定。^[19]为确保党的决议和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川陕苏区还建立了监察和巡视制度。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分别成立了川陕省委监察委员会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各县（市、区）党政部门也均建立有专门的监察机构。^[36]实行巡视员制度，在《各级苏维埃工作方法暂行条例》《赤色民警条例（草案）》《没收条例》等法规中对开展巡视作出了细

致明确、具体可行的规定，着力防范和解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同时广泛向群众公开宣传，主动接受监督，确保党的各项决议能够逐一落到实处。三是保持优良作风。川陕苏区建立过程中，党员干部始终充满了战斗到底的气概、克服困难的决心、夺取胜利的意志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面临敌人围剿的险恶环境中，表现很强的战斗力，不断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在面临生活困难、生存严峻的客观现实中，党员干部实干苦干，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入川时，红军进入通江两河口后不入户不扰民，大雨中睡在街边，良好的纪律作风在短时间内便获得了群众的认可。原南江县官禄乡苏维埃主席魏家乐，被诬告后，交出了一本清清爽爽的账目，连没收地主家里的一把锅铲和一把犁头都有去路，而他家五个人分的田和房却是全乡最差的，极大的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37]

三、特殊群体的统战工作及成效

徐向前曾提到“运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力争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是不可缺少的”。[38]红四方面军作为“客军”到达川陕地区，因战斗减员仅有 1.4 万余人。川陕苏区大小军阀林立，加之川陕交界有国民党胡宗南部、十七路军等军阀驻扎，苏区处于陷入被包围的紧张境地。面对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从实际出发，在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和发展川陕苏区创造条件。

（一）国军将领工作

充分利用川陕边区各路军阀间的矛盾，寻找统战工作对象，积极建立统战关系，有效瓦解敌对势力，是红四方面军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川陕苏区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周边国民党军队将领开展统战工作，取得比较突出成效的有杨虎城、杨森、任玮璋等。一是对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杨虎城已与杜丞斌、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结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救国纲领有一定了解。杨虎城主政陕西后曾大量

使用和共产党有关的人士，九一八事变后明确拥护抗日救国道路，具有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加之蒋介石对地方势力多有嫌隙，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区后，便违反常理下令杨虎城部的三十八军重返陕南汉中，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互换防地攻打红军，目的是通过两败俱伤从中渔利。^[39]初建根据地的红军通过十七路军地下党员武志平积极开展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并于1933年6月24日与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的孙蔚如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共同建立了为红军提供地图、药品、汽油、武器弹药等各类军需物资的秘密交通线。^[40]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给白区四川省委的信件中就曾提到，“请与汉中党联络送大批人来训练为要”。^[19]秘密协定解决了苏区的后顾之忧，让红军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围攻，对建设根据地意义重大，也一定程度上为后续西安事变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对杨森开展统战工作。国民党“三路围攻”失败后，刘湘继任“剿匪”总司令，带领各路军阀围剿红军。杨森部队实力在四川军阀中处于下风，有与红军建立互不侵犯、保存实力的意图。红军积极与杨森开展秘密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杨森的部队给红军提供子弹6箱、军服2000套以及帽、鞋、袜、毛巾、皮带、水壶、医药品等军需物资。^[41]“六路围攻”时，杨森被刘湘任命为第四路总指挥，红军与其签订“双方互不进攻”的秘密协议。此后一段时间双方在前线没有发生战事，为红军抵御“六路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对任玮璋开展统战工作。任玮璋曾担任国民党军杨森部第四混成旅的副旅长，后任渠县县长，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员李载浦的影响，创建了川北民众救国义勇军。通过开展统战工作，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玮璋率部前往迎接并宣布起义，为红军提供场所、物资等，配合红军有力反击了围攻红军的陕军、川军及军阀等地方势力，取得了通江、巴州、南江的解放。^[26]任玮璋的部队后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因作战勇敢立下了很多战功。此外，红军还积极开

展对田頌尧及其他军阀的统战工作。

（二）白区士兵工作

白区国民党官兵大部分是工农出生，大多受到压迫剥削、生活困苦、被迫参军。红四方面军积极开展白区士兵的统战工作，通过宣传教育、组织兵运、发动哗变，达到瓦解国民党军队、壮大红军队伍的目的，有效配合了川陕苏区的发展建设。一是设立专门机构。为针对白区群众和士兵开展统战工作，**1933年7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中指出“关于领导白区群众斗争和白色士兵工作，必须在省委组织白区工作和士兵运动两种委员会，与四川和汉中党的组织取得密切联系来进行”，并在省委到县委都成立了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讨论白区士兵工作。^[19]同时，中共川陕省委先后制定《关于白区工作决议案》《白区工作决议》等，系统制定白区士兵工作措施，主要由前线和白区党组织负责落实。二是开展宣传教育。苏区积极开展白区士兵的宣传教育工作，**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的总结》中就指出“要积极的宣传白色士兵，领导他们的斗争，组织他们兵变到红军中来”。^[19]中共川陕省委和西北军区政治部专门编有《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大纲》《对白军标语大纲》《关于白色官兵的标语大纲》《白军官兵拖枪投入红军的是大好处》等，由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白区士兵宣传教育工作。在日常工作中，主要通过本地群众的联系联络，设置石刻宣传标语，在白区国民党部队中建立地下党组织，向白区国民党士兵宣传红军纪律作风、起义政策、士兵待遇。在战争爆发时，设立火线宣传队，瓦解前线白军士兵战斗意志，争取拖枪投诚。三是保障切身利益。**1933年12月**公布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布告》中明确规定“对待投降、缴械的士兵，团防、精选队、民团、保卫团团丁、局丁，不仅不杀害，还分别给发奖金，对待军官，哪怕师长军长只要缴械投诚，保证不杀害”。^[19]

为方便白军官兵参加红军，红军还在通江城开办了白区招待所，向投诚官兵提供食宿和宣传政策，对不愿意参加红军的发给回家的路费。1932年至1934年，通过对白区士兵开展统战工作，成功发动了德阳孝泉兵变、南部升保农民暴动、安县保卫团兵变、盐亭保安大队兵变、万县第二次兵变、崇庆分州兵变、剑阁兵变等士兵运动，壮大了革命的声势，动摇了反动力量的军心，鼓舞了苏区群众的斗志，有效策应了川陕苏区的斗争，为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地方势力工作

为减小红军对抗国民党军阀的压力，红军积极开展对开明地主豪绅、地方团总、地方自发武装力量等的统战工作，引导他们同红军合作，共同对抗国民党军阀的欺压。一是边区匪患的统战工作。川陕苏区建立后，苏区政府采取政治瓦解、开展土地革命、军事打击、建设民众武装、宣传教育等综合措施，较为彻底的治理川陕边区土匪横行的问题，构建了苏区稳定的社会秩序。1934年12月通过的《中共川陕省委关于对反动团体斗争的决议》明确，“对于民团团丁、白军士兵、棒老二里面的弟兄和流神痞子等，一律欢迎其自首，改邪归正”。^[19]这些政策在瓦解土匪反动武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通江北200余里的两河口，“将盘据于曲江洞的王三春部职业土匪（棒老二）80余人，用标语、口号、传单、书信等方式，通过软化、感动而争取投降了”，摧垮了巴山土匪老巢；1933年5月，在前期联系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红四方面军通过书信促使陕南西乡县黑风洞大匪首袁刚一直未与红军对抗。^[42]同时，川陕苏区政府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根治土匪问题的根本。1934年12月的《平分土地须知》规定，“当过棒老二、土匪、小偷，只要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一样可以分得土地”。^[19]这些措施从解决土匪生计问题的角度，为瓦解匪帮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地方民团的统战工作。川陕苏区建立初期，红军避免与

地方民团发生直接冲突，通过会同当地党员对拥有爱国情怀的地方势力首领进行说服劝导，争取建立统战关系。苍溪县苟英寨新观团总马南卿，其子马正益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通过开展政治教育和直接影响，马南卿在掩护地下党活动、支持民团人员参加红军、提供军需物资、保护地下党员等方面给予支持，为顺利解放苍溪做出了贡献。^[43]在陕西镇巴县，共产党员宋明修、龚学义深入白区，分化瓦解国民党民团，收编西区民团裴元云部，吸收南区民团教练龚学信担任陕南县梅坡乡赤卫军营长，并在打击国民党军队及同民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三是地主豪绅的统战工作。红军利用地主豪绅被国民党军阀压榨欺压的实际，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如教育引导镇巴县土豪王亚山，使其拥护赞成土地革命，主动交出田地、枪械，自愿献出万担粮食支援革命。

（四）知识分子工作

川陕苏区把知识分子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对于白区专门技术人才坚持唯才是举、量才录用，甚至对技术人才制定特殊政策。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中明确了对专门人才的优待政策，即“白区医师、技术人才、专门家，服从苏维埃法律在赤区工作者，除应有工资外，如其家属进境，亦同样分得土地”。^[19]同时还颁布了《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明确“在苏维埃政府服务之专门家，忠实工作三年以上者，得以享有公民权或减免其本身犯罪之刑罚”“赤区内地主至富农有专门权能愿意苏维埃政权下忠实服务者，同样享受本条例之优待；过去虽参加反革命行动，有贫苦工农担保其悔过者，得减轻其刑罚”

“各种专门人材在苏区服务之薪金，不受苏维埃薪金条例之限制。每月薪额由六十串至两千串，有特别技能其薪资超过两千串者临时规定之”。^[44]面对苏区肃反扩大化和 AB 团清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家等专门人才，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害，如果这些人才愿意忠诚

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19]1933年12月出版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苏维埃》特别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招聘各种军事人才的启示》，公开召集赤区军事人才，一律特别欢迎；1934年2月川陕苏区《经济建设报》刊登了红军总医院《招聘医生的启示》，要求各地招募中西医生，明确只要忠心革命，愿为工农服务，按技术高下特别优待。^[45]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制定政治、经济、生活、家属、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待措施，争取了一批白区知识分子、国民党专门人才参与苏区建设。红四方面军红军医院大胆启用杨虎城部队谢南生、李开连、伍会元和川军蒲文荣、浦荣钦、杨成福、向桂林等一批国民党军队中起义和被俘的医官，都成为红军的骨干医生。曾当过国民党沙溪区团正的民间老中医杨成元，因医术高超参与红军医院工作，后被任命为中医院的医务主任、副院长。^[46]经过政治教育，原军阀刘存厚兵工厂厂长何阳州向党靠拢，1934年3月被委任为红军铜坪兵工厂厂长。在川陕革命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先后有60多名重要的专门人才被改造。^[45]

（五）工商人士工作

川陕苏区内以山地为主、位置偏僻，加之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根据地内的商品流通困难。川陕苏区的红军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的发展合作社经济，同时也制定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同白区开展贸易的政策，通过团结帮助工商人士，为川陕苏区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是保护苏区工商人士的利益。川陕苏区在法律法规中对保护工商人士利益制定了具体条款。川陕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苏区营业条例》，第一条就是“苏维埃政府对于遵守苏区法令的中小商人，均准其商业上的自由，并予以苏维埃法律的保证”。^[19]对大商人的利益，同样予以保护。1933年1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军区政治部布告》中明确“对于商人、老板和工厂主，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法令，缴纳统一累进税，

概不没收，一个商人就有十万百万的资本，都可在上述条件下，在赤区自由营业，受苏维埃法律保护”。^[19]为更正在商业上实行普遍没收，极端的妨碍私人资本在相当条件下的自由活动，1934年5月制发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没收条例说明书》中就明确指出，“没收不能普遍用来对付城市口岸的商人资本，使苏区商业停顿。这并不是苏维埃政府爱护商人，而是目前我们不能绝灭自由买卖来断绝物资品的来源”。^[19]虽然苏区并没有完全承认工商业人士的地位，但维护工商业人士的利益的措施，对发展商贸、缓解物资困难的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政策普及和实施，一些因敌人欺骗宣传逃离的中小商人重新返回营业，苏区商业贸易逐渐得到恢复。二是对白区工商人士做好团结工作。川陕苏区关注白区小商贩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注重开展对其的团结工作，提升他们与苏区开展商品贸易的积极性。川陕苏区《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了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的内容，指出“奖励开办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在严守苏维埃的法令之下可以允许商店工厂自由营业而且加以保护”。^[47]国民党的《新蜀报》中也有红军对商贩贸易保护的记载，“……惟对商人，则特别保护，故所有城镇仍照常赶集，盐茶纸烟各项，尚较昭广价廉……”。^[13]通过与白区商人建立赤白贸易，解决了苏区内部商品短缺的问题，同时苏区把木耳、茶叶等农产品出售到白区，为苏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经济基础。

四、川陕苏区统战工作的思考和启示

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我们党在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阀豪绅进行武装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2年12月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入川时不到1.5万人壮大到8万人。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

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川陕苏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密切相关，其中的历史经验对开展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党的领导是统战工作的政治保证，必须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从此在所有工作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为革命事业的推进和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川陕苏区在建立和发展中，建立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地方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群众生计得到了改善，红军队伍不断壮大。这些成就，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中共川陕省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革命斗争中坚持同张国焘的家长制和他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通过“木门会议”和在旺苍召开的县委书记和保卫局长联席会议、各级政治部政务科长与各县保卫局长联席会议等，纠正肃反、没收与征发工作中的错误做法，不仅有力实现了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一定程度上有效维护了特殊统战对象的合理权益，确保党的正确统战工作方针政策能够得到施行，为苏区取得土地革命、反革命围剿等各项工作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的重要政治工作，更加需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要把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作为根本准则，不断提升统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增进统一战线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贯穿统一战线各领域和统战工作全过程，为统一战线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证，确保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二）科学理论是统战工作的道路指引，必须实事求是、一以贯之

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

川陕苏区能够建立和壮大，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好的贯彻落实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有力的开展了土地革命，有效发动广大农民阶级参与革命，迅速壮大了红军力量，建立和巩固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具体的规定和办法并不完善，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土地革命还没有在党内形成普遍共识；同时对谁能够成为革命的同盟军、谁是革命的真正敌人还没有彻底清晰的认识；加之党内“左”倾错误和张国焘封建家长作风的影响，川陕苏区缺乏科学完备的统一战线理论指导，在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中存在曲折，导致川陕苏区缺乏持续发展的基础，最终红四方面军完全撤出根据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新时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以正确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理论，为开展统战工作提供科学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展统战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其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统战工作提供强大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同时，还要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紧扣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更多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工作实际，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基层统战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党的战略目标和工作要求，切实掌握和分析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社会阶层演变趋势，加强理论政策和实践创新研究，务实制定管用的工作举措，不断建立和完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汇聚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

（三）体系建设是统战工作的关键抓手，必须系统推进、持续完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各级组织中还没有专门统一设立负责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川陕苏区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主要是川陕省委和苏维埃在组织建设、宣传教育、群众动员、土地改革、人才优待、经济建设、白区士兵运动等各方面系统制定了统战工作政策，党的机构、苏维埃政权部门、群团组织和军队紧密结合各自领域的实际，共同推动

统战工作的落实，才能取得统战工作的良好成效，为苏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内外条件。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强调加强基层统战工作，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构建了完备的工作体系。这既是对建党百年来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保障。借鉴历史经验，下一步我们需要以构建统战工作政策体系为抓手，充分发挥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效能。既要坚持“统”，将统战工作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工作紧密结合，系统构建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还要做好“分”，由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落实统战工作主体责任，针对行业领域工作实际和党外代表人士的特点务实举措，切实维护统一战线成员的合法权益，了解掌握各行业领域统一战线成员的意见诉求，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真正推动统战工作沉下去、活起来、实起来，不断取得新成效。

（四）人民至上是统战工作的核心本质，必须铭记初心、坚决遵循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的立场和观点。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因为人民是我们党的深厚基础、坚实支撑和力量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川陕苏区的建立发展史，其实质也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斗争史。在川陕苏区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有**10**万多群众参加红军，组织运输队支援前线达**200**万人次以上。取得如此成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同时，川陕苏区特殊群体统战工作能够取得成效，关键的一点也就是建立和巩固了广大工农群众这一下层统一战线，使得居于上层的统战对象受到影响并接纳党的主张，起到加强和扩大上层统一战线的作用。统战工作是党的工作，必然要始终坚持以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是开展统战工作的最大底气，在开展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维护同盟者利益的同时，应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一基准，才能保证党的统战工作始终在正确的路线上行进，才能真正有效凝聚起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

（五）同盟利益是统战工作的必要条件，必须注重协调、有力维护

毛泽东同志曾总结到“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这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同样适用，且尤为重要。处于土地革命时期的川陕苏区，革命的基础并不深厚，要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需要广泛的发动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并争取一切有益力量。为此，川陕苏区充分照顾统一战线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提升工人阶级的地位，参与并领导革命斗争；通过土地革命，让贫苦的农民阶级得到安身立命的根本；与苏区群众一样分配土地、保障正常权益，给白区起义官兵、民团、土匪以生活的出路；制定落实特殊的优待政策，充分发挥医师技术人才、专家教员的作用。这些政策和措施不仅为苏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调动了统一战线成员投身苏区建设发展的积极性，达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目的。川陕苏区统战工作的历史证明，新时代的统一战线，构成成分更加多元、思想更加多样，更需要正确处理各阶层间的关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在精神层面做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物质层面切实保障统一战线成员的合理利益，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才会相信并团结在党的周围，也才能顺利开展对统一战线成员的宣传、教育、动员与组织，构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六）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主动作为、矢志践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

一战线建立的价值所在、使命所系，也是统一战线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川陕苏区的中心工作就是建设和发展根据地，抵御国民党反动势力“围剿”、开展革命斗争是核心任务，组织军事力量、开展经济建设是苏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始终服务于中心工作，将各类组织建立在基层末端，发挥组织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政治教育，在社会各阶级形成思想共识；积极开展重要群体统战工作，为确保苏区安全、成功打破“围剿”创造条件……在服务中心工作中，苏区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统一战线组成从人员数量上、成分类别上都不断增加，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发展和壮大，形成了统一战线在服务中心中发展、在发展中更好服务中心的双向促进良好局面。迈入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统一战线工作需要紧扣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时代任务，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在政治上形成共同追求、思想上高度统一认识、行动上找到着力重点，立足各自岗位、发挥优势专长、开展调查研究、贡献智慧力量，在维护国家统一、共促民族复兴中才能更好的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也才能充分实现统战成员的社会价值。

（七）自身建设是统战工作的立身之本，必须久久为功、提能增效

团结和影响统一战线成员，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崇高的奋斗目标、维护同盟者利益的政策，还需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政治品格、过硬的工作作风等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这些都来源于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在川陕苏区建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红军入川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实实在在的所作所为，短时间内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污蔑宣传，破除了广大群众的疑惑心理，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迈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成员大多为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翘楚，政治理论扎实、专业技能突出、素质普遍较高，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不能光作要求、仅靠说教，最核心还是需要通

过每一名党员干部带头做给党外代表人士看，让每一名统战成员深入理解、真正相信、内心赞同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统战工作干部是开展统战工作的关键力量，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在联系联络党外代表人士时，用坚定信仰、专业素养、优良作风影响人、说服人、引领人，在统一战线成员面前发挥示范作用，才有信服力，才能让党外代表人士坚定的听党话、跟党走。

参考文献

[1]林超，温贤美，刘炳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1995.

[5]张雪英，苏俊才.《闽西统战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6]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7]孔永松，叶正中.试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历史过程[J].党史研究与教学. 1984（03）：28-37.

[8]万建强.中共六大与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J].世纪桥，2008，10:10-13.

[9]段照珂.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 38(8):18-21.

[10]李远方.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思考[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4(1):12-14.

[11]佟德元, 钟日兴.川陕苏区政治治理体系探析——与中央苏区之比较[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6, 26(3):39-44.

[12]燕海荣.试论蒋(介石)刘(湘)关系史上的一次巨变[J].陕西教育, 2012, 5:20-21.

[13]张慧.对川陕苏区统战工作的探究[D].四川:西华师范大学, 2016.

[14]四川档案馆.《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M].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1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8.

[16]唐敦教.川陕苏区人权保障刍论[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27-31.

[17]罗其芳.试论川陕苏区的利民政策及其历史启示[J].党史文苑(学术版), 2007, 02:7-9.

[18]黄涓.川陕苏区的民生措施及执政启示[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8(8):70-75.

[19]四川大学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20]羊淑蓉.川陕苏区时期党的执政经验及启示[J].党史文苑, 2008, 5:8-10.

[21]宋键.川陕苏区政权建设的特征、成就和局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4, 24(3):7-11.

[22]唐敦教.川陕苏区的政治民主初探[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7, 17(1):17-22.

[23]刘长江.略论群团组织在川陕苏区的活动及贡献[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5, 1:17-22.

[24]郑丽天.中国共产党在川陕苏区的执政经验及启示[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8, 28(3):12-17.

[25]王平元.川陕苏区法律制度浅述[J].四川党史, 1997(5):26-31.

[26]巴中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公室.《川陕苏区——巴中卷》[M].四川: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

[27]马建堂.川陕苏区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与红军大学[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21, 31(1):21-27.

[28]马建堂.川陕苏区的干部教育及历史启示[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20, 30(4):57-62.

[29]吴丹.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D].四川:四川农业大学, 2016.

[30]杨富兰.川陕苏区时期党校干部教育的实践与启示[J].党史党建研究, 2021, 1:50-57.

[31]陈岗.川陕苏区时期廉政建设实践与启示[J].农业考古, 2016, 4:80-87.

[32]李茹, 李敏.川陕苏区党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1:13-18.

[33]代维, 朱姣姣.试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教育[J].安康学院学报, 2013, 25(2):106-116.

[34]李健, 王伟伟.党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经验解读——以川陕苏区土地革命为例[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1:1-6.

[35]刘长江.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42-48.

[36]林超,温美贤.川陕革命根据地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81.

[37]朱小宝.略论川陕苏区干部好作风[J].文史博览(理论),2014,12:6-8.

[3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39]李伶.从统战得失谈红四方面军的兴衰[J].党史博览,2020,09:63-67.

[40]鄢永都.川陕苏区石刻标语彰显统战威力[J].四川统一战线,2011,09:40-41.

[41]马宣伟,肖波.《杨森》[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42]马建堂,苟德仪.论川陕苏区的土匪问题[J].党史文苑,2011,10:18-22.

[43]广元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川陕苏区——广元卷》[M].四川: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44]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川陕苏区研究——红军入川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M].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45]毕瑛涛.川陕苏区人才建设的历史特点探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23(3):7-10.

[46]贾静.中医药在川陕苏区红军时期的作用[J].小康,2017,17:86-89.

[47]毕瑛涛.川陕苏区时期经济政策与经济工作的特点分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9,29(1):28-31.